

第 1 章

科学研究：目的、过程、价值观与责任

徐淑英 李绪红

学习目标

1. 了解科学研究作为知识获得的一种途径是如何帮助人类客观地理解和解释世间现象的
2. 理解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使命
3. 了解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以及研究过程的全貌和要素
4. 理解科学研究的认知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属性，及其对科学研究的选题和过程的影响
5. 了解科学研究应遵循的伦理，科学研究的责任，科学家自身的责任和价值观，以及以上对于学术环境的要求

1.1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使命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基本目的和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们致力于投身科学研究事业前应该理解的第一步。

1.1.1 科学的目的

科学的基本目的是求知，即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人类知晓真理的途径通常有四种：宗教或神论（words of god）、权威、逻辑及科学。科学是其中之一。

首先，来自某些途径的知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在人类历史初期，人们通过神话或者祖先传下来的智慧知晓真理。祖先告诉我们有创世神、太阳神、月亮神或者海神，如果有人在一年的某个时候遥望月亮，他们将会变成石头；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跟随神（无论是哪位神）的教诲，将能够成仙或进入天堂，又或者下辈子过得更好……信神的人相信这些说法就是真理，因为这些说法来自神；相反，不信神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直至今日，对很多人来说，宗教都是最有影响力的真理来源之一，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都认为神是自然界或社会中不能使用科学方法解释的许多现象之一，如爱因斯坦就承认神存在的可能（Clark, 1984）。

知识的第二种来源是权威。例如，当感冒或生病时，我们往往更相信医生，而非家政人员或出租车司机的建议；关于飓风如何形成、地震何时会发生知识，我们更加相信百科全书的说法，而非小说或漫画。权威也包括高阶职位上的人，如下属或追随者会相信魅力型领导或前雇主的说法或判断，这可能源于其正式职位或下属的身份感。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求知的第二种方法是请教某一领域的专家或求教于书本等权威途径。然而，我们对来自专家的知识必须保持谨慎，不能无条件接受，如我们知道医生在诊断时也会犯错（Welch et al., 2007）。并且，随着新证据的出现，知识也会与时俱进。更进一步，大多数权威（专家）的知识来自科学研究。然而，即使产生于科学研究的知识，也只是暂定的（tentative）真理，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做进一步的验证。

逻辑是知晓真理（至少是暂定的真理）的第三种途径。对于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我们更可能相信能提供很好论证的解释或观点，这样的论证本质上基于逻辑。诉讼律师最擅长使用逻辑，并娴熟地引用事实或资料作为支持证据或补充，来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为什么被告是无罪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4 年颁布的七个基础学科中，逻辑学位居其一，另外六个分别为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逻辑是物理学的基础，也是数学的基础。比如，物理学通过逻辑能提供合理的或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推断某一特定的粒子在特定的条件下有什么特定的运动方式。

逻辑即推理，是对自然界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常指有关社会和自然界的亚里士多德逻辑（Aristotle's logic）。形而上学与哲学分析相似，也是获取真理的第三种途径。虽然逻辑是理论的核心，但不需要经验的验证，不像理论属于科学方法的一部分。

科学是求知的第四种途径。除非逻辑与经验世界一致，否则仅仅只有逻辑是不足以建立理论以知晓真理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使用实证证据（包括数据或资料），来证明逻辑的正确性，来解释或预测自然或社会现象。通过科学过程所创造的知识较为可信，这是因为它既有逻辑（理论假说），也有证据（实证观察）。逻辑与证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求知的科学途径既包括逻辑的推理，也包括实证数据或观察得到的证据，因而被称为实证科学（Popper, 1968）。没有数据的逻辑或没有逻辑的数据，都不能算是完整的科学方法。

然而，科学创造的知识也只是暂定的真理，因为新的逻辑（理论）可能会出现，或者新的数据可能会推翻最初的逻辑。通过持续的科学研究，我们可以不断引入新理论和观察，从而不断更新知识。

我们致力于做科学研究往往基于不同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发表研究论文，为从事科学事业而做准备，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奇。无论我们的动机是哪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帮助我们解除对世界的困惑、寻找正确答案的一种可靠途径。“求真”必须是任何科学努力的首要目标。当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们的责任是去发现真相，不能让任何干扰使我们脱离这个目标。

1.1.2 科学的使命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巨大且不容争辩的。自然科学已经成功地解开了人体（如医学）、疾病（如生物学、化学、药理学）和宇宙（如天体物理学）等的许多谜团；社会科学在解释人类思维活动（如心理学）、社会团体和人际互动（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与人类行为（如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科学的目的是创造知识，而非应用知识。科学不能解决关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干细胞研究）是好是坏、某一研究方法（如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是优是劣的争执。科学研究应独立于政策制定和应用方面的考虑。但科学的目标是对客观现象（如全球变暖、传染病等）或社会现象（如贫困、不平等等）寻求理解、解释并且能够做出预测。通过应用部门（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科学的）政策决策，这些创造出来的知识就能被应用于控制或改善这些现象。

虽然追求科学与价值立场、政治考虑无关，但科学的终极目标是使当下或未来的社会变得更好。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保证我们的科学思维对于人类是福祉而非诅咒。”（Clark, 1984: 527）因此，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的目标必须同时包括认识论目标和社会目标。认识论目标确保我们创造的知识是可靠的，而社会目标确保科学知识的运用不会伤害人类、最好有益于人类（我们将在本章的1.4节讨论此问题）。因而，通过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本质规律，创造有利于应用的知识，以保护人类、改善人类的生活使之更加美好，这是科学的使命。科学的终极使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求美”。

对大多数年轻学者而言，开始一项科学研究如同在黑暗的房间里找灯的开关一样。“我应该从何处着手？”“我应该研究什么主题？”“我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做多少文献回顾才足够？”“我应该运用什么理论？”我们当然希望本书就是帮助致力于管理研究的学者找到“灯的开关”，打开“开关”以后，你就能看到很多事物，为现象找到答案。可是，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却远非这么简单。本书致力于为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帮助：“我该如何进行一项高质量的研究，在梦寐以求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从而使我的研究生涯有个好的开始？”“我怎样才能贡献对提升管理实践水平有价值的知识？”……当然，这其中涉及很多的选择，因为研究并非单一、线性的，你可以选择一条或多条最适合自身兴趣、能力和个性，最能让自己倾注热爱和激情的途径。

1.2 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研究过程

1.2.1 科学研究的现代观点

与从宗教或神论、权威、逻辑这三种来源获取的知识不容置疑显著不同的是，科学允许、甚至必须质疑——当我们使用科学的方法时，必须首先对科学研究同行的研究结论或所创造

知识的真实性或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因为任何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有缺陷的（我们将在 1.4 节中详细讨论这一点）。真相是反复测试的证据的积累，直到我们再也找不到能推翻那个知识的证据为止。然而，由于科学过程中的观察、分析、解释和其他因素的不完善，最终得到或揭示的真相也可能是一种假象。如果科学的目的是从现实里探索真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什么是现实（**reality**）。

真理依赖于科学家对现实所持的看法。如果科学家相信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这表示只有一个真理。如果科学家相信同一个现象可以有多个现实，那就存在多个真理了。这一点对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领域特别重要，因为人类的主观认知（如经验、体会、情感等）对社会现实有重要影响。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相信只有一个现实，且该现实独立于主观的经验或阐释，这是前现代观点（**premodernism view**）。此观点认为，玫瑰的美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反对者的观点都是脱离现实的。然而，大多数人都理解“各花入各眼”，玫瑰在不同人眼中可能是不同的形象——美丽的、多刺的甚至是丑陋的，这依赖于人们的感受或经验。如果同意这个观点，就等于认同人类的主观认知具有多样性，同一个客观现象可能有多种阐释，存在多个现实，这就是哲学的现代观点（**modernism view**）。现代观点认为既存在客观现实，也存在主观经验的多样性。如果科学家相信现实完全取决于经验，那么他们就持有后现代观点（**postmodernism view**）。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美丽存在于观赏者的眼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美丽的花朵这回事——美丽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有意义的只是对花朵的主观想法或诠释。现象学研究方法（**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Smircich, 1983）与看待现实的后现代观点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看待现实的前现代观点仅仅接受唯一的现实，个人的经验无关紧要，也不能改变现实；现代观点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是人们对其有不同的主观认知，因此客观现实和主观认知能够并存；后现代观点则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事实，只有对现实的主观印象或经验，这些印象和经验被认为是现实或真理。

前现代观点和现代观点的另一区别在于对“无法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存在的看法。我们肉眼不可见的事物，如“那些超出我们经验的，或那些太远或太小而不可见”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吗？前现代主义持“实在论”（**realism**）的观点，接受现实的存在性，即使我们自身无法看见（Okasha, 2002）。一个例子是原子或电子，实在论者相信，我们能够直接通过先进仪器或间接探测来研究它们和发现它们的存在。实在论者寻求发现能定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规律，目标是通过因果模型和解释机制来揭示超出我们个人经验的客观世界。这是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positivism approach**）。后现代主义观点持“反实在论”（**anti-realism**）的观点，认为我们只能研究我们能够直接观察的现象；任何无法观察的事物都是超出科学领域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信即便是用任何先进的工具探测或从探测中推断到的是真实的。反实在论者寻求通过反思或诠释方法学来理解观察或经历的事情（Risjord, 2014），以求能够解释。这是科学的诠释主义方法（**interpretivism approach**）。“批判实在论”（**the critical realism**）

view)的目标既是解释(explanation),也是诠释(interpretation)。批判实在论者基于复杂、分层和权变的过程或结构,为可观察的规律、事实和事件寻求一个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质的好的理由(诠释)。

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科学方法,是基于对现实持批判实在论的现代观点。我们选择要解决的难题和研究方法,取决于我们究竟是对客观现实还是对主观现实感兴趣,也依赖于我们所持的看待现实的观点。

由于社会科学领域探索的社会现象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反应性(responsive)的特征,寻求真相的过程就更具挑战性,这也是我们采用现代观点来看待现实的原因。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比如物质、天体等,很少会因为科学家的研究介入而发生改变,甚至鲜有反应。但是,社会科学家必须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想要认识的对象往往是有意识的、对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是有反应的。更进一步,被观察或被研究的对象很可能已经知晓那些用来解释他们行为的理论,他们甚至可能按自身的理解反过来又去构建如理论所预测的行为,这就是回路效应(looping effect),典型的例子是社会期许效应(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不仅改变了其研究对象,而且很可能创造了它想要研究的对象(即社会现实)。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不可知。只要社会科学的研究符合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研究人员之间存在共识或创造的知识有普遍性的根据,对于一个事物的认识有达成一致的途径,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可以达到如自然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标准(Risjord, 2014)。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采纳后现代观点来看待现实,因为如果每位研究者都认为自己所观察的现实是正确、有意义的,而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知识共识的概念完全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可能寻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总之,社会科学确实面临着与自然科学迥异的研究对象的特性,同时又存在着满足科学客观性要求的可能性,因此社会现象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历史偶然式的人类创造。故此,采取批判实在论的现代观点来看待社会科学的现实也就是我们的必选了。

1.2.2 科学研究的范式

理论的诠释,重要事实的确定,以及事实与理论的匹配,组成了科学的基本范式,我们称之为规范科学(normal science)(Kuhn, 1996)。规范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数据、证据或观察都是支持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规范科学的出发点可以是观察,也可以是理论。因而,诠释理论、寻找事实、将事实与理论匹配,便是规范科学的三种主要活动。基于共同范式的研究遵守同样的科学实践准则和标准,因此必须在基本准则与标准上达成一致,这是规范科学的必要条件和长期坚持的要求。简而言之,范式涉及对真理或现实的不同假设,而规范科学的范式是基于看待现实的现代观点。

科学的目的是为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难题寻求答案。规范科学范式决定了对议题、理论、

工具和选择。当现有的方法和理论不能针对现象提供满意的解释或理解时，新的理论或方法便将出现，并可能成为新范式的开始。Kuhn（1996）将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称为科学的演进。当人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包括不同的逻辑、不同的角度，或者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或测量手段，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这就是“科学革命”，比如人们解释人类决策行为的视角从完全理性转变为有限理性。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介绍这些看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规范科学的局限。遵循某个特定范式的科学家，倾向于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研究，以得到学术界的接纳。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人作为特定范式的忠实卫士，在追求投稿论文的理论新颖性的同时，也可能怀疑甚至不能容忍完全新的理论、逻辑或方法。因此，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从事科学研究的标准和准则，使我们的科学调查和知识的创造与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也会限制我们发现新理论、发展新方法或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年轻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为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遵循主流的研究范式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然而，戴上规范科学的有色眼镜，我们可能无法认识到特定性（如华人文化特色）现象，并且难以创造来自特殊场景的情境性知识。有关这一点会在第4章“情境化研究和管理知识创造”中做更为深入的探讨。由于价值观总会干涉科学的探索，这个理想状态更难实现（我们将在1.3节讨论价值观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本书将介绍的是研究管理和组织的规范科学范式（Kaplan, 1964; Kuhn, 1996; Popper, 1968; Wallace, 1971），一种主要流行于北美并得到全球管理学术界广泛采用的管理研究的范式。当然，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研究的实践、规范和传统也会存在一些差异。本书的目的不是比较这些不同的研究传统和范式间的差异，而是介绍这套“规范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研究方法。这套方法是管理和组织研究的主流范式，当前管理学界的大多数顶级期刊（包括北美及一些欧洲和亚洲的期刊）也遵循这样的范式。该范式对于研究中国（华人）管理和组织的部分议题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理解管理知识的现状及其发展过程，让我们参与现有的学术对话（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s），使我们能与北美学者们（或者一些使用或理解北美研究传统的欧洲和亚洲学者）相互合作，进而能在大家均认可的主流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对全球管理和组织知识做出贡献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我们对管理中国背景下的组织贡献有用的知识之责任和义务。

1.2.3 科学研究的过程

科学是对自然或社会现象做系统性的、施以控制的、批判的实证研究过程。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体现在，决定样本的代表性与测量的效度时使用确立的准则和标准，并且使用已有的理论来指导研究设计、解释研究发现。科学研究是施以控制的，因为在研究设计的过程中，为探索在给定研究情境下有意义的、列入观察的预测因素的作用规律，需要排除或控制对得

出有效结论有干扰的影响因素。科学研究是实证的，因为它是利用观察、问卷或其他实证的方法来检验理论解释的正确性。科学研究是批判的，因为研究者要对用于解释的理论的效度、数据的质量、结果和解释的可信度保持怀疑态度。

以下将讨论有关科学过程的一些内容，包括两类研究循环，科学过程的操作化、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研究设计，以及评价研究优劣的主要指标。

1.2.3.1 科学过程的两类研究途径与循环

科学研究过程是一个涉及许多活动的循环过程，既可始于理论，也可终于理论。科学研究过程首先假设研究者已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并且做了相关的文献回顾。一旦认为问题重要、值得研究，而已有的文献对该问题不能提供有意义或可信的答案时，研究过程就可以从理论或观察开始。从理论开始的研究是理论验证研究，即演绎性的假设检验研究（deductive hypotheses testing study）；而从观察开始的研究是实践解释研究，即归纳性的理论建立研究（inductive theory building study）。如图 1-1 所示，归纳导向的研究方法位于循环的左边，演绎导向的研究方法位于循环的右边。循环的上半部分是理论逻辑方法，即通过归纳和演绎的逻辑实现理论化的过程。下半部分则是实证研究方法，即运用实证方法从事假设检验研究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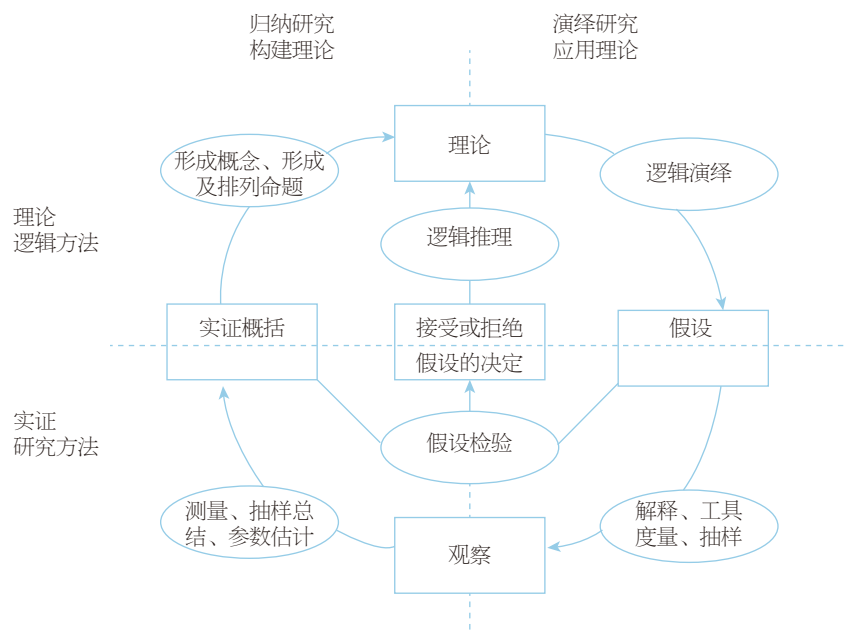


图1-1 科学研究过程：要素与两种循环

资料来源：Wallace（1971）。

假设检验研究遵循图 1-1 右半部分的流程。首先，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发展理论并转化成假设。假设是对研究问题的暂时或初步回答，包括可测量的构念，但不包括测量指标。例如，Westphal（1999）感兴趣的议题是首席执行官（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公司绩效的

影响。与此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有两个：一是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二是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基于代理理论，詹姆斯·D. 韦斯特法尔（James D. Westphal）提出了假设1（H1）：社会关系降低了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又提出了假设2（H2）：社会关系增强了董事会的建议职能。另外还提出了两个假设（H3、H4）：两个职能都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其次是研究设计。这部分工作主要包括确定所需数据或观察资料的类型、搜集资料的工具、记录数据的量表与合适的样本来源。这些步骤使得假设被转化成观察。我们还是以Westphal（1999）的研究为例，假设建立完毕后，就需要去搜集关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建议职能的数据、CEO和董事会的关系及公司绩效的资料。虽然战略管理领域的很多研究使用如Compustat之类的二手数据库，而且韦斯特法尔也的确使用了这样的二手数据来测量CEO与董事会的关系和公司绩效，但他同时也运用了问卷调查作为资料搜集方法之一，因为“董事会职能”构念的测量指标的数据在现有的数据库中无法得到。鉴于他的研究问题与所有设有董事会的上市公司都有关，因此他从美国工业和服务业公司的“福布斯（Forbes）1000名录”中随机选择样本。

接下来的一步，通过测量、样本归纳、编码、参数估计，观察被转换成实证概括。基于搜集到的数据，先提供描述性的数据归纳，如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且对每个假设的关系进行参数估计。通过估计这些参数的方向和大小，将观察转化成实证概括。

最后一步是检验假设的一致性，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这是通过逻辑推断对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决定接受、修改或拒绝的过程。

根据Popper（1968）的证伪观点，科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猜测与反驳的过程，我们运用个别具体的经验事实不断证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继而提出新的猜想，从而推进科学知识的发展。基于此，我们不能说备择假设（比如H1）被“证实”了。例如，虽然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了社会关系会降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得出这个结论依靠的是P值和统计显著性水平 α ，而显著性检验只提供统计量检验的概率信息，不能证明该假设（H1）是正还是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依靠统计显著性水平 α 旨在决定是否拒绝虚无假设H0（社会关系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没有关系）。如果此时H0在总体上是真，实证结果却显示了负向的显著关系，我们就犯了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即假阳性错误（false positive）。相反，如果现实是社会关系会减弱董事会监督职能，而我们没有发现社会关系和董事会监督职能之间有负向关系的证据，那么我们所用的样本（也就是目前的证据）“不拒绝”虚无假设。此时，我们就犯了第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即假阴性错误（false negative）。除非样本量特别大，我们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通常比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高得多。为了确保我们的研究发现是可靠的，我们可以通过复制研究（replication studies）消除抽样误差或随机性带来的误差，进而减少两类错误。

上述从理论开始，通过搜集观察资料来接受或拒绝假设的过程被称为演绎法。演绎研究

的成果是证实或推翻一组构念之间关系的假设，这些结果可被用于发展或改进理论；当实证结果不能完全回答研究问题时，也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建议。

研究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即由观察开始、以理论结束。这类研究适用于当研究者不能找到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疑惑（puzzle）或为研究问题提供答案的时候。这就是归纳性的理论构建研究，其成果是形成理论和命题（propositions），对疑惑或问题提供可能的解释或回答，其本质是对实践的解释研究，其过程遵循图 1-1 的左半部分的流程。由于在现有的理论中找不到解释，建立理论的研究是从观察开始的。

例如，在 Corley & Gioia（2004）开始探索组织身份转变（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hange）时，学术界对这个主题只有一些概念上的认识，因此他们通过分析一个组织分拆过程的案例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测量、样本归纳、参数估计来搜集观察资料并加以分析，将其转换成实证概括。初看，这个过程与假设检验研究的过程类似；但是，在假设检验的研究中，数据分析通常使用量化的统计方法，并且以实证概括来检验假设，结果或是接受或是拒绝。而在理论构建的研究中，数据分析常常使用质化的分析技术（如内容分析），进而产生编码，即实证概括。最后，实证概括通过形成构念、命题和命题组合而转换成理论。在 Corley & Gioia（2004）的研究中，他们对访谈数据和公司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产生了一阶编码和二阶编码，从编码中形成了抽象的构念，并且建立了解释组织身份转变过程的模型。基于该模型，他们提出了用于未来实证检验的命题。这个过程就是归纳法。归纳法研究的结果，是产生用于解释最初提出的研究问题或疑惑的新的构念或理论洞见，并形成暂时性的新理论，而新的理论能在未来用于解决相似的或相关的问题。

演绎法和归纳法在第 3 章“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中将会展开讨论。在演绎法中，检验假设的数据搜集方法包括实验、准实验、问卷调查及二手数据等；而归纳法往往涉及定性数据，数据搜集方法主要包括访谈、参与或非参与观察、档案分析等，案例研究是这些定性数据搜集方法的一个组合。第 5 章到第 13 章对这些方法有更详细的讨论。

1.2.3.2 科学研究的构念、变量、模型和关系

理论是使用科学方法建立知识的重要要素。理论解释了一个现象“是什么（what）”“怎样形成（how）”“为什么（why）”“何时（when）”及“对谁（whom）”等问题。管理和组织主流理论中的例子包括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 Fama & Jensen, 1983）、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 1983）、资源依赖理论（Salancik & Pfeffer, 1978）、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 1990; Burt, 1992; Granovetter, 1973）与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等。每一个理论都有一系列核心的构念（是什么），并且阐明这些构念之间的关系（这些“什么”是如何相关联的）。有些理论也会包括这些关系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地点及人物）会有怎样的改变。

在使用理论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如实证检验理论）时，我们将构念转换成变量（variable）。变量是以一定的刻度变化来反映构念的指标（indicator）。例如，两类变量或指标可用于测量“承诺”这一构念。一个是心理指标，如“员工想继续留在组织中的程度”（从

1 到 7 程度变化的态度量表，1 表示非常弱，7 表示非常强烈）；另一个是行为指标，如“缺勤次数”，缺勤次数越少、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越强。第 14 章对构念的测量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讨论。我们在此处想介绍理论模型中的五类变量：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与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如图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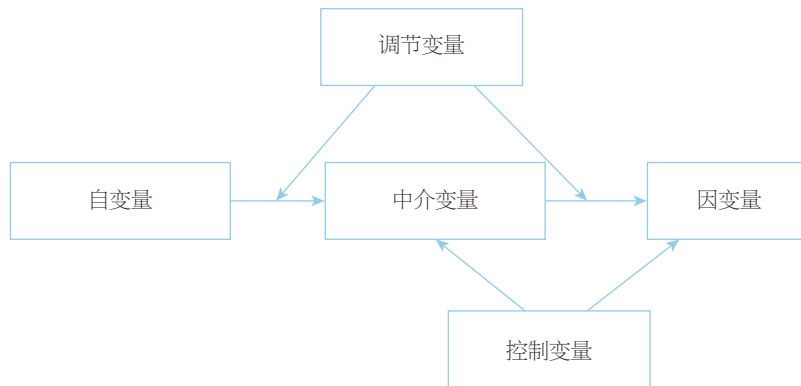


图1-2 理论模型中的变量类型

自变量，也叫预测变量，是因变量的假定原因；因变量也叫效标（criterion），是假定的效果。换句话说，自变量是前置变量，被假设为影响或者使因变量发生改变的变量；因变量是结果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对因变量有影响且其影响必须被排除的变量。在理论上，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是因变量的前置变量。自变量是我们关心或拟观察的变量，而控制变量则是我们不想观察但却不能完全排除影响（即不能实现随机化，或不能消除）的前置变量。

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检验其影响存在的统计方法也不一样，因而理解其差别非常重要。调节变量是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方向、强度的变量，既可以是类别变量，也可以是连续变量（Baron & Kenny, 1986）。从统计学视角看，调节变量可以通过检验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调节变量 × 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来发现。中介变量是介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变量（Baron & Kenny, 1986），是揭示二者之间关系的中间机制的变量。中介变量的存在需要满足下列条件：①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②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③ 当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受到控制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显著性降低。第 16 章将对如何检测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提供更为详细的介绍。

一个理论必须详细说明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理论机制提供了这些变量间相互关联的理由与逻辑。在理论化的过程中，通常使用方框和箭头来显示这些变量“为什么”“如何”“什么时候”与“对什么”相关联（Whetten, 2002）。缺乏逻辑机制时，方框和箭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有一个逻辑来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些变量及它们如何发生关联时，才可以检验这些

关系。有些理论不一定涉及调节变量，是用来刻画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强有力的主效应关系，有着跨情境的解释力和效度，这便是普适性的理论或知识，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理论创造的情境化。

1.2.3.3 科学研究过程的实践操作

当人们面对图1-1所示的科学研究的两类循环中的方框、椭圆和箭头而不知所措时，科学研究过程看起来似乎相当神秘。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过程不再神秘，给作为读者的您提供适当的工具来装备自己，从而在研究的丛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一个简洁而实用的科学研究过程的操作化路径如图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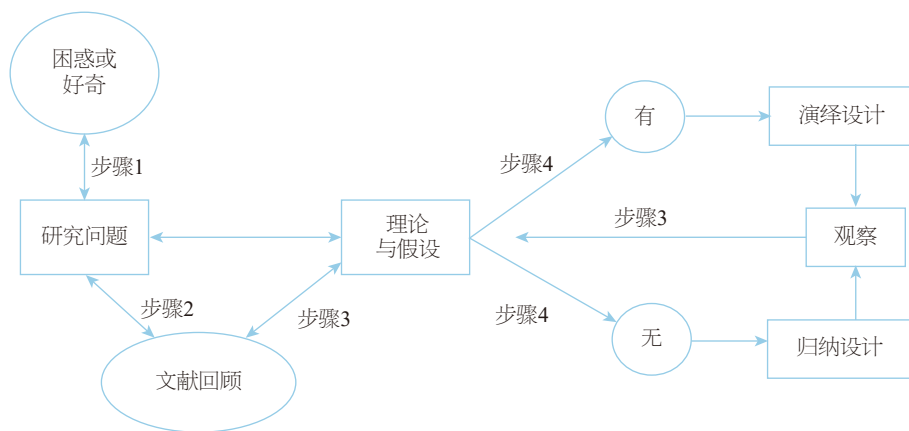


图1-3 科学研究过程的操作指南

对应两类研究循环的逻辑，科学研究过程的实践操作包含四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一个研究问题，第二步是进行文献回顾，第三步是找到或构建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第四步是设计并执行实证检验研究。上述四个步骤的方向依据研究是归纳性或演绎性的而有所不同。以下我们将做详细介绍。

第一步：提出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来自研究者对某一现象的困惑或好奇，陈述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答案，但却提供了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它有可能产生一些重要发现，但不包含价值或伦理判断。它通常始于“是什么”“为什么”“何时”“如何”等问题。例如，Chen（1995）的研究问题是：“在对组织奖励分配的偏好上，中国员工如何不同于美国员工？”本书第2章将详细讨论如何提出有趣并重要的研究问题。

第二步：进行文献回顾。一旦您有了感兴趣且重要的研究问题，就需要进行全面的文献回顾。它能帮助您判断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回答；也可帮助您找到一些相关理论来作为解决困惑的基础；它还能指向更加准确的构念，帮助改进研究问题，甚至通过发现以往文献的不足或察觉未经检验的命题，帮助您彻底修改研究问题，使之变得更为有趣和重要。

以上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是可能有回馈循环的。继续以前述 Westphal（1999）的研究为例，他发现在预测董事会对CEO社会关系的影响时，公司治理中的主流理论——代理理论与

社会网络理论是相互冲突的。通过发现文献中的这些差异，韦斯特法尔能够将该研究定位在检测相互冲突的命题上，从而发现一些异于直觉的结果。

第三步：找到或构建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假设。理论解释了现象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Kaplan, 1964; Whetten, 2002），包含具有清晰定义的构念，并使用清楚的逻辑解释这些构念为什么以及如何相关。已有的理论对于回答研究问题、产生有意义的假设至关重要。假设是对研究问题的暂时回答，是对构念之间的可能关系的陈述。假设涉及可测量的构念（如承诺），但并非测量工具本身（如缺勤率）。这些假设指引您的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工作。例如，在员工与组织关系的研究中，Tsui et al. (1997) 应用了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相互投资的员工与组织关系为什么及如何产生最高的员工绩效和组织承诺，并形成假设。

第四步：进行实证研究。该步骤包括研究设计、样本选择，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研究设计根据是归纳研究还是演绎研究而有所不同。当现有理论能够帮助形成假设时，可选择演绎研究，与此相对应的研究设计可以是实验、二手数据或问卷调查等。当现有理论无法对研究问题提供满意的回答时，则可选择归纳研究，如案例研究或其他定性研究方法（如访谈或民族志研究法等）。例如，根据承诺升级理论，Staw (1976) 设计实验来检验人们对一组选定行动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的假设。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来完全解释自我管理团队中的协同控制（concertive control），Barker (1993) 运用案例研究来研究这个现象从而建立了理论。因此，在归纳研究中，实证研究先于理论和假设，于是第三步和第四步的顺序会颠倒过来。

综上所述，科学过程的四个步骤不一定遵循单一的方向：一些步骤相互之间存在循环，一些步骤之间的顺序可能颠倒。从第一步到第三步，也就是从研究问题到文献回顾、再到理论与假设的过程，基于文献回顾的研究问题可能会被修改或精炼，这又会影响文献回顾的领域及其关注的理论，因此在这些步骤之间会有一些来来回回的循环。从第三步到第四步，即从理论与假设到研究设计的这两个步骤也可以颠倒。当现有理论无法解决困惑或无法解释感兴趣的现象时，学者可以从归纳法的实证研究开始，先进行观察，然后再提出命题或新的理论。

1.2.3.4 研究设计优劣的衡量标准

研究设计是实证研究中调查的结构和计划，以用于得到研究问题的答案（Kerlinger & Lee, 2000）。衡量一个研究设计好坏有两个标准：一是控制变异，二是确保效度。

一项研究中的控制变异包括三个方面：最大化系统变异（maximize systematic variance）、控制外生变异（control extraneous variance）与最小化误差变异（minimize error variance）。

系统变异是指因变量的差异，它受到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的影响。通过最大化系统变异，可以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效应从因变量的总变异中分离出来，用以支持假设中的构念间关系。最大化系统变异可以通过选择自变量和因变量变异都较大的样本或者对变量的精准测量来实现，这些方法都是致力于使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最大的效应。例如，在研究薪资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时，如果研究者选择的样本中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满意，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他们的薪资水平都相似，那么研究者要获得预期证据的可能性将非常小。

外生变异是指外生的或是理论框架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变异。必须将外生变异最小化、予以排除或隔离，才能减少或消除对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关系的其他解释。控制外生变异可以通过随机化、配对参与者或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来达到。例如，如果要调查创新对公司利润的影响，研究就必须控制公司规模和行业。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不是研究的关注点，但它们却影响了公司的利润。控制了这些变量，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得出结论，即公司利润的变动是创新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规模（大公司的利润可能更高）或行业（一些行业可能比其他行业利润更高）的影响。

误差变异是指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指标变异。使误差最小化，就能让系统变异凸显出来。最典型的随机变异是测量误差，或者研究者控制不了的未知因素。最小化误差变异可以通过控制数据搜集过程的条件及增强指标的信度而实现。例如，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只是选择公司在某一天的股票价格来测量，这样的测量则是不太可信的，因为选择不同的时间来测量同样一家公司，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总之，不管是演绎研究，还是归纳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必须对以上的差异控制目标了然于胸。

好的研究设计的第二个标准是保证实证研究的效度。效度指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实证调查的结果。研究设计应该确保四种效度，包括构念效度、内部效度、预测效度和外部效度（Cook & Campbell, 1979）。

构念效度是指测量的准确性，即构念指标的信度。测量指标所包含的意思与构念的定义相一致吗？第14章“理论构念的测量”将详细讨论构念效度。

内部效度指结果是否真的由所假设的原因（预测变量）导致，会不会是因为其他因素而非假设中描述的原因引起？研究设计如何改善内部效度将在第6章“实验研究方法”、第7章“随机对照试验及准实验研究”、第9章“问卷调查法”、第10章“案例研究”和第11章“二手数据在管理研究中的使用”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预测效度，即统计结论效度，是以统计检验对假设的关系进行解释的可信度。样本太小、P值太大或违背了统计检验的假设（assumptions）等，都会降低结论的可信度。另外，影响误差的因素，如不可靠的指标、在数据搜集过程中的条件波动等，也会对统计结论效度有影响。

外部效度，指假设的因果关系能否应用到对因果变量的其他测量方法，能否推广到不同类型的人、环境和时间当中（Cook & Campbell, 1979）。当在样本的统计检验中找到显著的因果关系时，研究者就要问自己：这些结论是否只适用于这些人、这样的环境和采样时间？增强外部效度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随机抽样。当由于实施困难使样本的随机性不能保证时，需要明确地讨论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例如，如果使用2022年北京市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研发强度”的影响，就需要讨论据此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高科技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能否推广到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或者能否推广到2022年之外的其他时间段。

外部效度告诫我们，需要清楚研究结论所处的情境边界。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将情境因素（如人、环境、时间、文化等）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也许可以产生更有趣、更重要的研究问题。这些情境因素要么是自变量的前因变量，要么是可能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调节变量。例如，Farh et al.（1997）对于华人社会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平关系的研究，得出了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在华人社会不同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因此，国家层面的情境成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该研究也发现，对于传统价值观较低的人来说，组织公民行为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相关性最强。因此，传统价值观成为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平关系的调节变量。第4章讨论了情境如何影响研究设计和知识创造。

1.3 科学研究与价值观的关系

过去一百年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追求客观、独立的科学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学者也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尊重。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的价值无涉理念（value-free ideal）逐渐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研究几乎无法排除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那么，科学研究是否承载价值观？哪些价值观应该用来指导我们的科学实践活动和评判科研成果的质量？是否需要一直被认为可能带来主观偏见的社会价值观的介入？社会价值观究竟在科学实践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在进行科学活动时恰当地遵循或应用价值观，发挥价值观的重要引领作用，以发展负责任的、好的科学。

1.3.1 科学研究是否承载价值

1.3.1.1 科学界的价值无涉理想

人类从未停止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解释。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在其经典著作《论实证精神》（1996）中指出，人类思辨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哲学三个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主要借助上帝和神灵来解释外部世界。在形而上学阶段，人类开始尝试抛弃神秘的超自然因素，转而使用本质、绝对真理（fundamental truth）和其他抽象概念来解释外部世界。这一阶段依赖推理的思辨虽然还具有追求绝对知识的性质，但它使人类的理性获得充分的发展，酝酿了真正的科学发展。

在实证主义哲学阶段，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放弃了纯粹抽象的逻辑推论，不再强调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开始强调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做出缜密的客观观察，找出事物或对象之间稳定关系的发展规律以解释外部世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要求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都必须基于所观察到的事实，因此需要通过科学的测量，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数量化表达，以此来观察、解释、预测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与此哲学理念相对应，追求客观性（objectivity）的价值无涉成为现代实证科学家致力坚持的原则之一。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培根提出了价值无涉科学（value-free science）

的原则：为了完整、充分地了解所研究的现象，科学家应该保持中立，对研究对象不带有任
何情感成分。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必须放弃自己的主观偏见，充分地将各种可能的观点、
潜在的反例和其他影响纳入考虑，避免过早地形成片面的假设（Bacon, 1620）。根据这一观
点，大卫·休谟明确区分了主观价值和客观事实，强调客观事实的存在状态（is）与它应该
是什么（should）之间的区别（Hume, 1740）。在现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马克思·韦伯也提
出了价值无涉科学的思想：科学永远不能和研究者的主观意愿产生关联；人类的价值判断可
以被系统性地纳入研究中，以了解采用某些价值观的后果和副作用，或检验为实现某种目的
而采用的手段是否适当，但是它不能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观察（Weber, 1904）。从认识论
（epistemology）上，客观性意味着科学的目的在于捕捉客观现象的本质特征，科学家必须如
实地表述客体和相关的过程；从方法论上，客观性意味着科学家需要寻求支持自己理论的证
据。只有检验某种假设的过程不是随意的、主观的，所有独立的观察者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
我们才能接受这种知识（Douglas, 2009）。

总而言之，在价值无涉的原则下，实证科学家相信只有遵循严格的观察程序，才有可能
捕捉所观察现象的本质。科学工作应该只由内在的科学价值引导，远离社会价值。价值无涉
的科学理念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主观喜好的嵌入视为对研究客观性的一种严重威胁（Carrier,
2013）。基于这种理念，价值无涉原则强调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必须通过消除宗教和政治等因素
对科学活动的干预来实现（Douglas, 2009）。

毫无疑问，现代科学范式诞生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为人类文明和整体生活
质量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追求学术独立、坚持研究客观性的价值无涉理
念也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科学界一直致力追求和捍卫的目标之一。当其受到挑战时，科学
界都会快速地做出反应。例如，针对近年来不少领域出现研究结果的不可复制问题，《自然》
（*Nature*）杂志组织了针对全球 1 576 研究者的问卷调查，希望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科
学家群体对这一问题的看法（Baker, 2016）。《科学》（*Science*）杂志组织专刊，邀请了来自各
个领域的专家讨论本领域的可复制性问题（Jasny et al., 2011），而心理学家更是组织发起了
“可重复性项目”（Reproducibility Project），呼吁志愿者对三本重要的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以及 *Psychological Science*）在 2008 年发表的研究中的 100 个实验结果进行重复
研究（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这些例子反映了科学界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的极度重视。作为保障科学客观性的主要途径，价值无涉传统有着合理性，这一传统为科学的健
康发展，以及科学和科学工作者赢得社会大众的信任 and 尊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1.2 价值无涉的不可能性

在反对者看来，价值无涉理念是一个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想法（Douglas, 2009）。当科
学变得与实践越来越相关时，专业知识的探索和非认知的利益和愿望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广泛的社会价值的作用，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如此。自然科学

中，科学家面对的研究对象既有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又有本体论上的客观性。例如，土星的存在、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人类的认知无关。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复杂，虽然可以努力实现认识上的客观判断，但一些内容还是由集体的态度构成的，这部分内容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Risjord, 2014）。换言之，社会科学家要面对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以及由人类活动构成的各种结构（如团队、组织和行业等）。人、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互动性质的回路（looping effect）（Risjord, 2014）：社会科学家的观点和理论来源于其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而这些观点和理论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社会现象的变化。在科学进程中的每一步，价值都显现其中，这是社会科学中价值无涉理想不可能的原因。而价值无涉理想不可取的原因是，社会需要可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实践，需要科学家的理论和证据来做出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决策。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应该主动将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纳入思考框架，因为科学的主要使命是满足人类需求，让社会变得更为美好。

1.3.2 科学过程中的两种价值观：认识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与科学有关的价值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Douglas, 2009; Tsui, 2016）。第一种是认识论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是用来判断理论和证据充分性的规范或标准。它是与知识创造直接相关的价值观，是“规范和良好的科学推理标准的一部分”（Risjord, 2014），主要用来评判科学过程是否可靠（sound）、严谨，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真理，体现的是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s）。例如，简洁性、范围界定和解释力用于评估理论的一些认知价值。就简洁性价值而言，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个简单而优美的理论要好于一个复杂的理论。

第二种是与科学认识活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无直接关系的价值观，也就是除认识论价值观之外的其他价值，包括广泛意义的社会价值、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以及政治价值。我们用“社会价值观”这个词来统称所有非认识论的价值观。科学家的社会价值观往往与其个人的信仰、经历、教育等因素高度相关，它们体现的是个人或社会的承诺，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间达成的某种协议或约定，是与社会、团体或个人期望有关的状态。比如，财富或健康是一种社会价值，而公平正义是一种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反映了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偏好，例如，资助机构会指定研究的类型或确定可以接受的期刊类型等。

好科学（good science）往往是认识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有机统一。认识论价值观是在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科学界逐渐发展出的评价科研工作的价值体系（Douglas, 2009），用来评估科学工作者是否创造了接近客观真相的可靠、有效的知识。如果一项研究不能满足认知标准，就降低了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或准确度。我们所熟知的例子是前文讨论的四种效度。如果一项研究未能达到这些效度的阈值标准，我们就认为从研究结果推断出的知识可靠性或准确性较低。认识论价值本质上是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的标准。

价值无涉理想（value-free ideal）认为，研究者的个人价值或个人偏好不应纳入认识论价

值评估中。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选择都会涉及价值判断，个人价值观在科学活动或对科学活动评价中的介入是难以避免的。比如，由于测量的真实可靠性是不确定的，当我们面对决定 0.80、0.70 或 0.60 是否表示可接受的可靠性水平（即信度）时，社会价值就已经起作用了。

社会价值观不是科学工作的内在价值，但可能会对研究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所创造的知识的可靠性。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如正义、自由、社会稳定或人类尊严，往往与道德价值相重叠。比如，将人类作为研究对象时，出于保护被试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科学发现过程的有力证据。又如，我们已经知道研究存在着归纳风险（inductive risk），可能犯第一类错误，也可能犯第二类错误。我们选择更加容忍哪一类错误，实际上也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发现某类产品含有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物质，第一类错误（假阳性，即当推断有害而事实上产品无害时）会导致政府实施不必要的管制，以实现保护公众的良好初衷；第二类错误（假阴性，在推断无害而事实上产品有害时）会增加危害公众健康的风险，因为研究结果将错误地建议政府实施宽松的监管政策。对于公众而言，当然希望增加监管，即更加容忍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加；对于企业而言，当然希望放松监管，即更加容忍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增加。为了减少这两类错误，我们一方面需要增加样本量，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到底选择怎样的归纳风险水平？应该以哪一方的诉求为标准，是公众、行业、还是学者？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由社会价值观而非认识论价值观来决定。

这两种价值观在科学中的作用，即其对科学的具体影响如表 1-1 所示。

表1-1 两种价值观在科学中的作用

	认识论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
直接作用	作为评价科学推理和证据充分性的标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理论的性质：如范围（简单与复杂）、准确性（弱与强）、适用性（狭义与广义） · 理论假设：清晰性和合理性 · 研究方法：方法选择、数据搜集程序、数据解释；效度、信度、样本代表性、恰当的统计程序；统计敏感性设置、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容忍度 	作为约束或目标，但不干涉科学本身的推理过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议题选择：选择从事或资助哪些项目，如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歧视、工作压力、老龄化等） · 权衡新技术研究的成本和收益：如转基因生物 · 研究方法或对象选择：伦理考虑，如在测试药物时使用动物还是人类作为被试，当研究对象是人类时如何保护
间接作用	基于证据、理论对认识论价值和认知价值的修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填补推理依赖的不完全信息（推论缺口）的空白，并评估错误推理（归纳风险）的后果 · 经济和社会成本的权衡：如I类和II类错误的后果及其容忍度 · 是否坚守公正、安全、隐私

资料来源：改编自 Tsui（2016）。

1.3.3 两种价值观对科学研究行为的影响

坚持客观性的认识论价值观在促进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两个显著的作用：确保研究的意义（*significance*）和证实（*confirmation*）的强度（Carrier, 2013; Douglas, 2009）。就第一个作用而言，认识论价值观描述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和真理寻求路径的目标。例如，现代科学强调在广泛领域内发现有效的知识和普遍性的认知规律。科学知识可能包含孤立的信息，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出逻辑一致的理论去解释与预测外部世界。同时，实证科学的认知价值格外看重观察数据对理论假设的支持，以及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强弱。测量的精度和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成为现代科学考察研究结果的重要内容。科学家们希望通过严苛的观察程序，多维度地寻找对研究假设可靠、一致的数据支持（Douglas, 2009）。通过遵循追求客观性的认识论价值观，科学活动就有效排除了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科学目的被严格地限定在发现事实、寻求客观规律的范畴。这样的自律和共识表达了科学家社群对保证研究客观性的集体承诺。

社会价值观也对科学研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个人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例如，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其价值观导向可能不同于致力于探索“公司如何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学者，可能也不认同“所有者是公司唯一合法的利益相关人”的说法。学者享有探索的自由，可以选择任何他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课题。但是，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课题的选择，如课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受欢迎、容易发表，或者在实践中是否重要等。

对于应该做“严谨的（*rigorous*）研究”还是应该做“致用的（*useful*）研究”，在学界争论已久，因为二者被假定是对立的。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使用最严谨的方法研究最具实践性的课题的。近年来，美国管理学会呼吁学者应该和实业界加强交流，要求他们既要研究具有实践价值的问题（Tushman & O'Reilly, 2007），也要积极地将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与管理者多做沟通（McGahan, 2007）。AMJ 2016年12月和2022年6月的编辑特刊的全部文章，都是围绕管理研究中实践与学术相结合的问题而写。2016年12月特刊是有关“社会的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 in society*）；2022年6月刊的主题是“商业和管理议题的与社会对话”（*Joining societal conversation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与此相关的最新的一项倡议活动是“商业与管理中的负责任的研究”社群，旨在推动创新可信又可用的知识（具体请浏览网站 www.rrbm.network，以及本书附录一）。

当前全球（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有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面临晋升和评定职称的压力，从而必须大量发表论文。于是，一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流行的议题，从事机会主义式的研究，避免从事难以发表或花费时间过长的研究，即使那些题目是他们感兴趣的。当然，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如果能产生好的科学成果也无可厚非，然而遗憾的是，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往往是快捷、粗劣的，通常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和精心的设计，而只是为了

文章容易发表，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品质低劣的研究结果。换言之，这些机会主义式的研究不是由兴趣等内在动力驱动，而是由外部回报指引的。

避免困难的课题、追求流行的课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选择。通常，这些选择会产生一些对新知识没有什么贡献的、微不足道的研究及其成果。我们的建议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初衷。既然学者做科学研究有选择的自由，科学工作又要求全心投入，那么只有让兴趣来指引研究选择，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我们一定要成为研究工作的奴隶，那就成为我们所热爱的研究工作的奴隶吧。

MOR 曾于 2009 年用一整期（第 5 卷第 1 期）来讨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提醒学者们注意研究课题选择中的盲点。该期的文章指出，中国学者在过去 20 年专注于学习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也许都符合国际期刊的发表要求，但是可能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的目标相去甚远。未来的中国管理研究应当专注于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企业中面临的重要管理问题。从现象中来、而非从过去文献中来的知识，既有利于发展科学理论，也有利于改善管理实践。

1.4 科学研究的责任与伦理

科学是现代社会的项重要制度。如本章的 1.1 节所阐述的，科学的目的是对自然真理的追求，其使命是应用所发现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社会。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希望本书能使作为读者的研究者具备从事高质量管理研究的必要技能。然而，任何的科学研究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非方法论的伦理或价值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但影响从事高质量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会影响身为学者对学术生涯的追求和承诺。具体来说，价值观影响了方法的选择、研究设计的严谨，乃至研究议题本身的选择，而最根本的是，它影响了对学者事业成功的定义，从而影响学者学术生涯的意义。

1.4.1 当前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伦理危机

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应该是客观的、没有掺杂私利的行动者，应该是将自己的事业生涯致力于社会福祉提高的公共服务者（Merton, 1973）。回顾美国商学教育和管理职业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历史，管理研究走向规范化、产生可靠知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 Gordon & Howell（1959）的研究，在发布的报告中作者呼吁“通过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来提高商学院的学术质量”（转引自徐淑英和杨治，2018），建议将管理视为一门科学，鼓励研究人员建立一套经过实证检验的知识体系，包括新的理论和概念，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用于解决商业或管理的实践问题（McLaren, 2019）。商学院对这一呼吁作出了回应，开始聘用来自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数学和统计学等学科拥有博士学位的新师资。Gordon & Howell（1959）发表后的三十多年被视为商业和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

商学院的学者们通过理论和实证发现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建立了商学院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声誉（McKiernan & Tsui, 2020）。

然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并不是大多数以理论为导向的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个人更关心在各自学科中的声誉和地位，而非为多学科的团队项目做出贡献”（Khurana, 2007: 283）。学术界与管理实践界的鸿沟不断扩大。1993年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里程碑。年初，《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管理学已死》（Samuelson, 1993），接着美国管理学会（AOM）时任主席唐纳德·C. 汉姆布瑞克（Donald C. Hambrick）对此做出回应，在1993年年会主席致辞中发出“假如管理学会不存在会怎样”的疑问。他的结论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我们，事情可能会发展得非常、非常好”（Hambrick, 1994: 11），并要求我们的学术社群更多地关注象牙塔之外的真实世界。更多的学会及其主席们加入了这个呼吁，要求会员“更好地将我们的研究与我们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DeNisi, 2010: 196），包括 Hitt（1998）、Van de Ven（2002）、Cummings（2007）、DeNisi（2010）和 Tsui（2013b）。Anita McGahan 在2017年亚特兰大 AOM 年会中的学会主席致辞演讲“学术的自由：从亚特兰大所学到的”中的总结语既有力又鼓舞人心，她清醒地提醒：“我们离成为有爱心的社会科学家的集体愿望还很远”，要求我们为（所有人）真正和可持续的繁荣而努力：“我坚持认为，大街上的问题（the problems on the street outside）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很多大街上的人，都被那些由商学院在20世纪创造的规则与想法来管理的组织所遗忘……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在21世纪之初抓住我们身边有意义的问题，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和与实践的合作和参与，来从事研究。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活。”（McGahan, 2018）

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在管理大类的其他学科也存在：市场营销（如 Reibstein et al., 2009）、运营管理（如 Tang, 2016）、会计（如 Rajgopal, 2020）和财务（如 Zingales, 2015）这些领域学会的主席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现在，更多的声音鼓励学者更好地为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的决策者提供科学信息（Stephen & Pauwels, 2018; Jack, 2020）。

除了学术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之外，从21世纪1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员还开始报告可疑（不道德）研究实践的盛行（Bedeian et al., 2010）。一些学者不惜一切代价，采用各种做法，尽最大可能提高在A级期刊上成功发表文章的机会（Aguinis et al., 2020）。虽然少有学会会公然造假，但很多学者承认了或多或少的“过失”（Schwab & Starbuck, 2017）：管理学（如 Tourish, 2019）和心理学（如 John et al., 2012）的学者已经揭露了通过操纵数据以找到最佳结果、只选择和报告有统计显著性的发现（P-hacking）、在统计结果已知后形成或修改假设（hypotheses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简称 HARKing）等问题。这些做法使得大多数已发表文章的结果既不可信也不可复制（Ritchie, 2020）。这被称为复制危机（the replication crisis），它给医学（如 Harris, 2017）、心理学（如 Nosek et al., 2015）、管理学（如 Tourish, 2019）

和一般科学（如 Ritchie, 2020）的研究界敲响了警钟。

例如，Goldfarb & King（2016）分析了管理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 2003—2012 年五大顶级期刊（每期 60 篇）上发表的 300 篇文章以及 60 份会议投稿，运用模拟来估计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他们发现，这些论文中 38%—40% 的重要结果无法重复得到，那些可被复制的研究所报道的效应大小有 13% 的夸大，这些发现在已发表文章和会议投稿论文间没有显著差异。

Bergh et al.（2017a）研究了战略管理研究中的信誉危机。他们分析的 SMJ 的 88 篇线性回归或结构方程建模文章中，超过三分之二（70%）提供的数据和处理方法信息是不完整的，无法进行复制；在可复制的研究中，他们通过重复性测试，即使用相同的数据重新检验假设，发现几乎三分之一的假设无法得到验证（Bergh et al., 2017b）。Hubbard & Vetter（1996）使用数据，分析了会计、经济、金融、管理和营销领域 18 本顶级期刊中 1970 年至 1991 年的 4270 项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经济学和财务金融领域的复制研究不到 10%，而管理和营销领域不到 5%。Camerer et al.（2016）关注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的论文，实验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更为稳健。他们分析了 2011—2014 年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中的 18 个实验，发现 61% 的能够成功复制，效应大小为原始估计值的 66%（原始研究中的平均效应大小为 0.47，复制研究中为 0.28）。此研究的优势在于 18 位原作者对复制研究设计的肯定。该文进一步报告，非实验性的经济研究有 13%—23% 的复制成功，75% 以上不可复制。

复制危机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它也存在于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McKiernan & Tsui（2020）将当前的研究生态称为与几十年前的“黄金时代”相反的管理研究的“至暗时刻”。

1.4.2 科学研究的责任

1.4.2.1 研究致用（usefulness）

研究致用是选择研究议题时应遵循的责任。我们的期刊要发表有利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有利于所有者或股东。詹姆斯·P·沃尔什（James P. Walsh）等人合写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提醒我们，美国管理学会是为公共利益而创建的，正如 AMJ 的创始编辑所写，“学者的事业旨在帮助工业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从而为公众服务”（Walsh et al., 2003: 859）。但与此背离的是，对于 AMJ 自 1958 年创刊至 2000 年间发表的所有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我们的学科领域对经济性目标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性目标。事实上，大约 80% 的实证研究关注企业绩效，只有大约 20% 关注人类福祉，如健康、满意度、公正、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等。Tsui & Jia（2013）用类似的方法，对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六大英文顶级期刊和三大中文期刊中所有使用中文样本的文章进行研究，统计数据分析显示，几乎 90% 的研究聚焦在经济绩效上，显然为股东的经济目标服务是首要的。徐淑英教授 2012 年在 AOM 上所作的主席演讲呼吁将研究的“致用”扩大到公司的股东、

所有者或高管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以减轻人类和地球的痛苦（Tsui, 2013b）。

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的另一个趋势是对理论的关注，甚至是过度关注。Hambrick 指出，这种关注可能是“过犹不及”的，间接地质疑了我们对理论如此执着导致的研究的低致用性问题。他指出，一般管理领域的期刊比市场营销、财务和会计类期刊更强调理论，这种对理论的执着和热衷可能“不必要地限制了研究”（Hambrick, 2007）。他建议，期刊应重视无理论的有趣事实的报道，这有可能产生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徐淑英担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任期内（2011—2012年），在 John Hollenbeck 领导的期刊委员会的说服下，董事会批准创建《管理发现》（*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杂志，致力于发表现象引发的、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颖而复杂的问题的研究。

然而，对五大经济学顶级期刊（T5）^①的分析表明，强调新颖性和理论开发的期刊可能会阻碍创新研究（Heckman & Moktan, 2020）。创新性的论文更多地出现在非 T5 期刊上，这可能源于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审过程倾向于让对已有理论或范式有继续贡献的研究过关，而拒绝那些偏离这些想法或范式的研究，以及没有理论解释的有趣事实的研究。Akerlof（2020: 406）观察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给予的奖励偏向于“硬”（如数学建模）而非“软”（如问卷调查），这导致了“疏忽过失”（sins of omission），从而使得学者无法触及重要问题（如金融危机、全球变暖等）或难以用“硬”方法处理的问题。

好在，自我纠错也随之启动（Alberts et al., 2015; Harris, 2017）。一些重要的管理学期刊的主编相继发表社论，对过于强调理论新颖性的现象进行反思，如 ASQ 的主编探讨了管理研究往何处去的问题（Davis, 2015），提出理论新颖性与实践真实性、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研究者应考虑自身角色，以及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如工程师、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探索有真正意义的研究议题（Barley, 2016）；JOB 认为一线期刊对于理论新颖性、独创性和有趣性的追求，导致实证检验已有理论的文章无法发表，使得理论的可复制和被检验的机会丧失，因此学术研究似乎走入了死胡同，可能会出现伪理论（pseudosocial theory），让学术研究偏离科学方向，而对现实世界缺少解释力和预测力（Nicklin & Spector, 2016）；Sackett（2021）认为，旗舰期刊以牺牲其他贡献（例如，强大的数据、方法或实践）为代价的“理论优先化”令人担忧；Staw（2016）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变得更具语境和现象驱动力”；Latham（2019）和 Rousseau（2020）都呼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多个期刊亦采取了相应的对策。AMJ 发表了社论（如 Tihanyi, 2020），鼓励并邀请作者加入社会对话、解决重要问题，并认识到“有趣”是不够的。一些期刊开设关于当今社会重要议题的“特刊”，如 OBHDP 的“中国现象驱动的理论发展”特刊（2019年），SMJ

① T5期刊分别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的“问题驱动和现象启发的实证战略研究”特刊（2018年）；AMJ的“社会的重大挑战”（George et al., 2016）和“管理学会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现”（Howard-Grenville et al., 2019）特刊；JAP关于理解工作场所种族主义的专刊等。其他学科的期刊也推出了类似特刊，如《市场营销杂志》（*Journal of Marketing*）（Chandy et al., 2021）和《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Netessine, 2021）。一些期刊编辑要求作者在其文稿中添加研究的社会影响的描述，还有一些期刊正在增加“与实践或社会的相关性”作为评估文稿的附加标准。这些鼓励偏离传统范式的研究，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好的实际行动。

虽然研究范式的变革是缓慢渐进的，但这样的改变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停止那些抑制学者好奇心和雄心的举措，建议他们做出最好的作品。考虑管理科学研究的致用性，要将研究资源投入重要的研究问题中，创造致用的知识，帮助企业及其相关组织健康发展，让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1.4.2.2 研究可信(credibility)

在大家讨论研究的实践导向并付出实际行动缩小学术—实践鸿沟的同时，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也在凸显，即有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Bedeian et al., 2010）。这些做法威胁到已发表研究的结论的可信度，包括那些A级期刊上的论文。研究的信用危机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Honig et al., 2014; Schwab & Starbuck, 2017; Tourish, 2019）。

Bedeian et al. (2010) 基于美国104个有博士点的管理系的1940名研究人员的样本，概括了11种导致研究不可信的做法。超过70%的人提到隐瞒方法细节、选择性地报告结果、未知会而借用他人的想法；超过50%的人提到删除数据以改善统计结果、隐瞒与先前研究文献相矛盾的数据或发现；超过25%的受访者报告有同事们捏造结果、公然作弊；大约92%提到HARKing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类似的趋势。John et al. (2012) 对2155名美国心理学家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的研究实践中以上做法的参与频率。结果显示，前三位分别是：①未能报告研究的所有因变量（66%），②根据结果决定是否收集更多数据（58%），③选择性报告“有效”的研究（50%）。

考虑到发表压力，以及社会现象确实呈现高度模糊，可能涉及许多替代解释或“多重可实现性”（Risjord, 2014: 125–127），数据篡改可能是或被鼓励或被容忍的。这些做法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和不可靠或不可重复的结果。但已发表的研究很难检测是否存在这种缺陷，因为大多数论文都没有包含足够的方法细节，导致无法回溯审查或复制。

可信知识的基础是观察到的效应是稳定的，实践问题的“处方”不能只基于一项研究的结果或无法复制的效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多少复制和多少成功复制后的研究结论是可以接受的，仍然是一个未有共识的问题，然而原则应该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越多越好”。许多关注复制危机的研究人员开始呼吁优先考虑“真相而非发表”和“复制而非新颖性”（Nosek et al., 2012, 2015; Van Witteloostuijn, 2016）。

1.4.3 科学家的责任

正如前文指出的，可信危机和致用危机导致当前这一科学研究生态系统进入“至暗时刻”。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是时候强调科学精神（Tsui, 2013a）和对社会做有责任的研究了（Tsui, 2015）。毋庸置疑的是，钥匙就掌握在学术社群自己手中。国际管理学界的先锋学者已经意识到并致力于采取行动改善科学研究的生态。

1.4.3.1 科学规范和元科学

2015年，由来自10个国家的、横跨5个专业领域全球顶尖的24位学者，以及与商学教育密切相关的4个协会的领导人发起“负责任商业和管理研究”（Responsible Research in Business & Management, RRBM）运动，呼吁科学工作要以严谨（vigor）和切题（relevance）为标准，以负责任的管理研究为使命，致力于创造可信的并能直接或间接运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重要问题的知识。只实现这两个标准中的一个都不算是负责任的研究：不可靠或不可重复的研究结果可能会误导实践，关于琐碎问题的可靠结果对社会没有用处。RRBM的使命是促进和催化商业研究从当前的以数字游戏为目标，转变为重视研究内容并解决社会重大关切问题的研究生态系统，产生使企业成为积极变革推动者的知识。负责任的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善人类的社会、经济和可持续生活上，并进行严格的研究设计，以确保研究结果可靠、可复制，同时对错误结论的后果进行仔细评估。为此，RRBM提出了负责任的研究的7项基本原则（具体内容见本书附录二的RRBM立场宣言）。

RRBM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生态系统里的各利益相关者的自我纠正努力表明了研究界的第三项责任（Tsui, 2021），即对我们专业的责任。这是为了保护研究机构的神圣和正直，确保我们有责任地享受作为学者的自由权利，并正直地履行我们的科学责任。科学家不仅有责任“正确地做事情”（技术上正确，即知识可信，科学的第一个责任），而且有责任做“正确的事情”（道德上正确，即知识致用，科学的第二个责任），还有责任关注培养新生学者承担其科学责任，界定科学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观，进行自我纠正，并将“越轨者”带回到正确的路上。这是科学的第三项责任，也是科学家的责任所在。

为履行这一责任，基于爱因斯坦、库恩和默顿等科学巨人的思想，受美国科学进步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声明和RRBM的使命和愿景的启发，Tsui（2021：184–185）和Tsui（2022：23–24）提出了五项科学规范：思想独立（independence）、客观超脱（detachment）、公正无偏（impartiality）、谦逊敬畏（humility）及开放共享（communality）。这些规范补充了RRBM提出的负责任研究的七项原则。七项原则是实现负责任研究的结构性的指导方针，五项规范是普遍接受的有关科学行为的非正式指南。原则和规范具有互补功能，不能互相替代，它们联合起来指导研究人员在进行科学努力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研究界还有一种工具可用于履行第三种责任，即元科学（metascience）思想（Enserink,

2018)。元科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它使用定量分析来研究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影响科学结论的真实性；它也不同于研究方法，因为它更广泛地关注导致科学工作成功或失败的因素（Schooler et al., 2016）。元科学旨在理解、识别和纠正可能牺牲研究结果可信度的研究实践。它只关注可信度问题，以研究覆盖的数据或描述为基础。元科学家相信，更好地理解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能为更好的科学做出贡献。

Tsui（2021，2022）鼓励管理研究界考虑成立一个负责任的研究委员会，由核心商学和管理学科主要期刊的编辑组成，作为科学第三责任践行的监护人。

1.4.3.2 科学家和科学社群的责任

科学探索的准则来自学界内部，而非外部（Kaplan, 1964）。科学家（学者）为他们的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对科学界负有责任：学术界对科学研究可接受的方法和研究质量的标准制定准则，而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经由同行评审过程被评判。作为科学社群一员的期刊（杂志）编辑和同行评审人，对于研究论文中报告的知识成果是否接近真知、用来创造知识的方法是否达到了学界所制定的严谨标准（这些标准有些是明显的，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明显）做出评判。

以寻求真理为名的科学研究过程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呢？例如，未征得他人同意或未在他人知情的情况下，研究者可否观测他人的私人行为、侵犯别人隐私（如Humphrey, 1970）呢？或者，可否使参加实验的被试者相信他们是对他人施加痛苦的同谋者，从而造成被试的心理压力（如Milgram, 1963）呢？这些行为符合伦理规范吗？学界达成了一致的观点是：不可以为了研究目的（探索知识、真理）而不择手段（寻找知识的途径）。

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不同科学领域的专业学会或协会（医学、工程、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等）都已经或逐步建立起“研究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为研究者的伦理行为提供了指南。在美国和欧洲，大学和资助机构设有评审委员会，在研究资金拨付或项目批准以前，要求研究者遵守伦理准则（已有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采取类似的做法）。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有义务保障他们研究对象的权益，无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学生、员工还是组织。IACMR 学会的伦理准则见本书附录二。该准则阐述了在研究和专业活动中的伦理行为，适用于所有的 IACMR 成员。它明确地说明了在评审和编辑过程中对待研究对象和数据的准则要求，以及研究思想交流和参加会议相关的专业行为标准。在许多专业学会的网站上也能找到相似的准则，如美国管理学会、美国心理科学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等。美国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在对商学院质量进行认证的指标体系中，将管理教育和研究的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放在了2020年8月发布的修订版认证标准的前沿和中心位置（<https://www.aacsb.edu/accreditation/standards/business>）。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在研究和发表论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困境，MOR 曾用一整

期（2011年第7卷第3期）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文章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其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读者可以通过研读这些文章了解到许多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如做了怎样的贡献才配得到论文的署名权，是否可以基于数据结果来修改或者提出研究假设，是否可以用同一套数据撰写多篇论文，如何及何时引用他人的成果、评审和编辑过程中的伦理等。

记住一个出自《圣经》并被称为黄金定律的普遍原则——“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相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学者，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那么我们也应该尊重参与我们研究的人、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的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生活经验的人，以及允许我们使用其研究成果的人。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工作受到别人的认真对待，我们应该以最严谨的态度从事我们的研究。我们绝不容忍在数据处理上的任何有意的缺陷或遗漏，对结果的不准确或歪曲的解释，对其他学者研究论文的不恰当或无标注的引用，以及在未得到认可或同意的情况下侵犯其他学者的知识产权等行为。

达尔文曾说过，“错误的事实严重损害科学的进步。”粗制滥造的研究及对他人工作结果的故意误用，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这些错误最后被发现或纠正，带来的伤害也无法弥补。医学界曾因论文质量问题取消过往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发表资格，这些论文的发表给医学的学术界和实践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爱因斯坦也曾谈到过科学中的伦理行为：“人类最重要的努力是为我们行为的道德性而奋斗，我们的内部平衡甚至我们的存在都依赖于它。只有我们的行为具有道德，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

作为读者的你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之前，我们建议你首先仔细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位社会研究者”。为了金钱？名声？为了思考的自由？还是为了有机会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你所拥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个人职业生涯的意义，以及所能做出的贡献。

学术生涯不会让你发财致富。虽然学者的薪水每年都有增长，成为科学家也确实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些收入与管理咨询、金融行业（如投资银行或者股票市场的基金经理、研究员）的收入是无法相比的。学者的财富更多在于拥有思考的自由及满足好奇心的机会；从事学术工作，我们不会每天受到严格的行为监控；除了教学时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自由地思考、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是选择学术研究这条道路的重要回报。

学术生涯不会让你出名，至少不会很快地出名。由于成果发表过程的滞后和顶级期刊版面资源的竞争，学术生涯所经历的失败往往多于成功。因此，我们需要靠内在激励，即被自己强烈的内在热情及所喜爱的研究课题驱动，等待很久以后才会到来的回报。

科学上的成功与其他职业生涯的成功相比较，自有其独特的评价标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翰·C·波拉尼（John C. Polanyi）说过：“在科学界，我们是一群来自全球、互相支持的个体，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真理放在个人利益之上”。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伦·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认为：“评价一位科学家，不应基于其所获得的奖项或荣誉，而是其对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贡献。”换句话说，成功跟随那些视贡献为成功的人，而不

是来自个人的名声或收入。这也意味着科学家的成功应该基于其所创造的知识，而不是由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决定。

发表论文只是一种工具，用以传播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知识。我们不应陷入“只关注发表数量而不关注研究质量”的陷阱当中，以工具代替目标。对发表篇数的追求已使得一些学者玩起数字游戏，故意将一项研究拆分成许多篇小论文，或者从事机会主义的研究。

科学的价值或目的是寻求真理，是为了准确、有效地理解并解释我们周围的现象，其终极使命是在各个领域改善人类的生活。通过科学，包括管理学，我们创造知识与技术，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管理学者而言，科学研究是为了帮助组织提升效率、提高产出、增加利润；也是为了造福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社会、政府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使得大家共同成长。如对员工而言，帮助组织成为更友善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有前途和回报的职业。近些年涌现的对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的关注和研究热潮，便是这一终极使命的研究践行的一个表现。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研究的贡献，将是学术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回报。

1.4.4 好科学的前提：科学的自由

1.4.4.1 科学自由与负责任的研究

科学探索行为与探索自由（autonomy of inquiry）的原则相关（Kaplan, 1964），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自由选择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课题。但是，对研究—实践的鸿沟、可信度有问题的研究的担忧，以及师资招募和晋升中对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及其数量的强调，导致了在科学工作中，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反而被弱化。一些学者（如 Glick et al., 2007）观察到，年轻学者面临着持续的“要么发表要么走人”的压力；Walsh（2011：215）认为，鉴于当今商业的中心地位，这应该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但“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无法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

Terry Mitchell 写道：对于升职、获得终身职位以及成为正教授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我敢肯定，这让很多人的行为方式伤害了他们和这个领域。他们不重视教学，他们做‘安全’研究，他们走捷径。就领域本身而言，似乎许多人都精疲力竭，转而从事其他工作。当然，有很多优秀的研究工作从未以发表的形式出现过，非常聪明的人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洞见都会因此消失。”（Mitchell, 2018：17）

Tsui（2016）论述道，工具理性（学者个体的职业关注或学校领导层的优先排序）主导了教师评估系统中的内容和方式、发表期刊的等级以及评判和奖励教师的决策。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已经成为论文机器，失去了科学自由。这种“减少的自由伴随着减少的责任感”（Tsui, 2021：181）。研究人员已经对错误结论的风险变得麻木不仁，因为没有人要他们为错误负责。此外，伪造数据或其他可疑行为也似乎没有任何惩罚。从多个期刊上撤回论文的作者还能受聘到薪资更高的大学。如果没有对此类明显不当行为的公开制裁，其他学者将如何改变他们

的行为？官僚理性（使用非人性的评估标准，如论文发表或被引用的数量）和工具理性（为晋升或拿终身教职）将研究人员变成了 Mills（2000）所称的“快乐木偶”，在中立、无偏或客观的虚假外表下工作。这些木偶真的很快乐吗？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社会和民众的福祉，作为科学社群中的一员，我们也应关注科学家自身的福祉。

Tsui（2021：180）进一步引用爱因斯坦的话阐述了这种自由的重要性：“科学的发展和精神的创造性活动需要一种自由，即思想独立于专制和社会偏见的限制。”库恩声称，探索的自主性是自然科学成功的主要原因，这种思想的独立性“允许个体科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上”（Kuhn, 1996：164）。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的正式声明也强调了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的重要性：“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对于增进人类知识以造福所有人至关重要。科学自由是从事科学研究、追求和应用知识以及公开交流的自由。这种自由与科学责任密不可分，其践行必须伴随着科学责任的践行。科学责任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本着保护环境的精神，在尊重人类权利的情况下，正直地从事和应用科学的义务。”（Jarvis, 2017：462）

商学院、期刊、协会和认证机构不断推出的制度变革为践行负责任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支持学者从事有益于社会和有意义的研究的愿望。时至今日（成书之日），负责任的研究运动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进展。除了期刊发表的规范制度和大学、研究机构评聘制度的变化（李绪红等，2018），管理、营销和运营管理学科都设置了负责任的研究大奖，以表彰最近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表现。一些学校要求教师在年度自评中包括一份关于其研究的社会影响的声明。RRBM 组织了全球峰会，讨论不同利益相关者推动负责任研究的行动。这种努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中国十大商学院正在引领管理研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2019 年的峰会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领导中国的这一变革；2020 年的第二次峰会吸引了 100 多名院长参加。

1.4.4.2 科学的自由与年轻学者的培养

资深学者的努力为年轻学者树立了好的榜样（Harley 2019；McKiernan & Tsui, 2019）。McKiernan & Tsui（2019）特别鼓励有声望的教授积极参与博士教育的培训，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学者。培训不仅需要学习从事科学研究所要具备的技术、技能，还需要讨论科学哲学的相关主题，如客观性、科学与政策、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在科学中的作用，以及对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的准确理解。虽然对于那些深受现有范式影响的人来说，转变是困难的，但希望在于“年轻的和正在崛起的自然主义者，他们将能够以不偏袒的态度看待问题的两个方面”（Kuhn 1996：151）。过去百多年科学进步的历史也鼓舞着我们对新一代学者寄予信任和希望。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大多数年轻学者可能不愿冒危及其职业生涯的风险，从事他们判断难以在高等级期刊发表的研究课题，或者攻克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然而，也有许多年轻学者敢于冒着风险，不顾顾问和导师的建议，研究他们所热衷的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伊沃纳·希代格（Ivona Hideg），她不顾反对，决定研究长期产假政策（long-term maternity

leave)。她的论文(Hideg et al., 2018)获得2019年“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大奖。她目前在约克大学担任副教授,是AMJ的副主编。另一个例子是温·蒙哥马利(Wen Montgomery),她对底特律的水问题很感兴趣,想用定性的方法来研究它。有人建议她选择一个更安全的话题,但她捍卫自己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自由和责任感。她的论文(Montgomery & Dacin, 2020)也获得了“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大奖。蒂玛·班萨尔(Tima Bansal)在二十多年前从事“可持续性”话题的研究时也有类似的经历。事实上,这个奖项的大多数获奖者都是年轻学者。由于商学院必须满足AACSB关于展示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的新标准,从事负责任研究课题的年轻学者将在招聘和晋升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

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是齐头并进的。动机很好,但一些实质性支持也很重要。RRBM正在推出两个针对博士生的项目:一是“负责任研究的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课程,二是“大胆关怀博士论文奖学金”(Dare to Ca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larship),鼓励博士生研究组织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包括经济、性别、种族和其他形式的不公正(可在www.rrbm.network网站上搜索这两个项目的信息)。RRBM将在未来几年内致力于培养世界各地的博士生成为RRBM立场宣言中提出的“愿景2030”的火炬手。

1.5 结语

中国的管理研究就像一个深埋于地下的巨大钻石矿,一般人还没有挖到足够深就放弃了。然而,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脑中有正确的方向、手中有合适的工具、身边有相互鼓励的伙伴,就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个成功的故事。我们强烈建议本书的读者学习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本章分享的很多内容,在我们和其他同事一起开设的“管理研究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上都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从2015年开始,我们陆续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设该门课程。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管理研究哲学”师资培训班(2022年的第五届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为全国几十所高校培养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师资。

本书致力于让研究者掌握合适的研究工具,我们也衷心希望大家在掌握科学研究工具的同时,明白我们从事的事业应对社会负责任的使命。2019年以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了许多人的决心,即管理研究应成为一股变革力量,帮助实现更好的商业和更人性化的社会。

八十多年前,Merton(1942)说科学事业是一种召唤,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不是陈词滥调;爱因斯坦说“只有为他人而活的生命才值得活”,也不是陈词滥调。让我们利用和捍卫我们从事重要和有意义的科学工作所需的自由和责任,秉持科学精神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一起通过科学探索,为建立更美好的世界,贡献学者应有的力量!

思考题

1. 科学的目的是和使命是什么?他们如何与科学家的三个责任相联系?

2. 在创造知识时的科学方法是什么？为什么相比其他获得知识或智慧的方法或途径，一些科学方法更好或更差？
3. 为什么对于实在论的不同观点的理解对于科学家很重要？每一个观点如何对待科学知识中的“真相”？
4. 理论和观察在演绎法和归纳法中的角色有何不同？
5. 在研究设计中，变异控制与四种效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6.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哪种价值观是核心的，哪种价值观是情境化的？
7. 为什么本章强调负责任的研究比工具性研究更重要？这两种研究与研究伦理精神和科学的目标分别有什么关系？

延伸阅读

Douglas, H. E. (2009).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6), 1346–1352.

Kuhn, T.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kasha, S. (2002).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sjord, M. (2014).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Tsui, A. S. (2021). Usefulness, credibility and scientific norms: Reflections on our third responsibility. *Die Unternehmung*, 75 (2), 175–187.

Tsui, A. S. (2022). From traditional research to responsible research: The necessity of scientific freedom and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for better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9: 1–32.

Van de Ven, A. & Johnson, P. E. (2006). Knowledge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802–821.

徐淑英、李绪红、贾良定，等。(2018). 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安德鲁·H. 范德文(2023). 人世治学：组织与社会研究范式与实操. 杨百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洛雷恩·伊登、凯茜·伦德·迪安、保罗·维勒。(2022). 为师之道：青年学者研究、教学与公共服务指引. 秦一琼，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